



“抗战研究七十年:回顾与展望” 学术讨论会综述

张 岩 闫 勇

抗日战争真正进入学术视野发轫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70年的积累与发展,特别是自1991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与《抗日战争研究》创刊以来,抗战史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成果日益丰硕,迄今抗战史研究已呈蔚为壮观之势,抗战史已经具备了独立学科的属性。厘清70年来抗战研究的学术轨迹,总结和检讨研究过程中的得失,探索未来发展的进路,对于打造更为成熟的学科体系与学术共同体极有必要。职是之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抗日战争纪念网于2019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南开大学举办了“抗战研究七十年: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

此次会议共邀请专家、学者40余位。其中既有在抗战史研究领域耕耘有年的学术骨干,也有通过征文遴选参会的新生力量;既有中国史专业的同行,也有日本史方向的学者;既有作者,也有出版社、期刊的编辑。目的是通过对话激发思想的火花,群策群力把抗战研究继续发扬光大。开幕式由《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抗日战争纪念网副主编暨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唐智轩、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江沛代表主办单位分别致辞。王建朗指出,在中国近代史所有时段的历史研究中,抗战史研究最为热门,近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近30项课题的立项更助推了它的热度,但热门之下仍有诸多研究不充分的地方,即便是积淀较深的研究议题也还有继续讨论的余地。

会议围绕抗战学术史的梳理总共进行了六个场次的讨论,内容既有整体性与概念性问题的梳理,也包括具体专题性的梳理,其中在中共抗战、日本侵华等专题上讨论较为集中。现将与会学者发言简要介绍如下,以期引起更多的讨论。

一、整体性与概念性问题

北京大学臧运祜的《抗战史研究的冷与热——中国抗战史研究70年之我见》一文,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即抗战研究的前40年,总体的研究状况是“冷”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抗战史进入“渐热”状态,并逐渐达到高潮。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仍然是“热中有冷”“冷中可热”。诸如“中国十四年抗战史”的问题,中国抗战史的定位问题,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与民众生活、文化教育与思想、沦陷区、日本侵华方面的研究等,仍较为薄弱;又如甲午战争与抗日战争的比较研究,战时中共及其军队与根据地,国民党及其政府与正面战场在基层、底层的状况,战时中国的第

三势力、少数民族、西北与西南大后方、华侨华人等方面的研究,战时的日伪政权及其关系问题,日本战后的历史认识问题,沦陷区的经济、社会、文化问题等,都是可以成为或已开始成为热门的专题。

南京大学陈谦平的《十四年抗战史的分期问题》,主张抗战史应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七七事变之前的局部抗战、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中国单独全面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国际抗战。其中最后一个阶段最为重要,它奠定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基础与中国战后的国际地位,乃至现在的东亚国际秩序也是由此奠定的。

南开大学李金铮在《抗战整体史之叙述困境》的报告中指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完成一部主线清晰、内容全面、叙述客观、令人信服的抗日战争通史。但从目前的整体史叙述来看,还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如何进一步去呈现支撑抗战的基础性的社会、经济、文化力量(即体现抗战深沉的历史感),值得思考;其二,抗战的主线除了抗日斗争之外,还存在另外一条主线,即国共之间的分歧、矛盾、斗争、摩擦,也是应该去呈现的;其三,对于国民党战场的叙述,其敌后抗战的篇幅相对较少。

《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吴志军的《学术史治理与抗日战争研究的理论化进程》,指出抗战学术史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是需要超越抗战史本身,关注历史研究者如何看待、研究和表述抗战史;二是要将抗战史研究放到一个更为宽泛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加以定位和理解;三是要进一步探讨抗战史研究所依靠的历史哲学基础、思想理论预设、史学问题立意、核心价值观念以及叙事结构风范等,集中分析抗战史研究的历史和史学理论与方法。

南京大学张生的《穿行于“碎片”之中的历史学以及应有态度》,认为历史研究不能回避碎片,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要碎片化,对碎片的研究是指向重大问题的必由之路;微观化与精细化并不等同于碎片化;碎片化的成因是受时代变化引起的史学变化;在个别研究中,碎片化有导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历史的本质是整体性与延续性,作为历史核心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碎片化研究是应该拒绝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的《“全面抗战”“全国抗战”及其他——兼谈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概念的择用、适用和语境问题》,考察了在抗战史研究的文论中,指代中国抗战的一系列概念的使用状况及所指意涵,认为“全面抗战”一词在不同时代的语境下都有适用性,提醒人们不应将之僵化地限制在特定语境中使用,更不应将之贴上特定的政治立场标签。

二、中共抗战专题

上海财经大学张屹的《抗战时期的中共群众动员问题:近二十年研究述评与问题省思》,梳理了21世纪以来学界有关中共抗战群众动员问题的研究,认为当前研究呈现出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态势,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理论框架,揭示出了抗战群众动员的具体方式,关注到了抗战群众动员中的各类群体,并由此实现了三个转向,即从传统党史、革命史向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视野转向,从“宏大叙事”向“微观叙事”的历史书写模式转向,从单一史料向多元史料的史料运用方法的转向。当前研究的问题在于,由于对日文史料的挖掘与利用不够,未能从日本视角考察中共抗战群众动员的基本态势,同时也未能全面考察中共、日方及群众等多元参与、多方博弈的复杂互动过程。

南京大学李里峰的《战时中共的乡村政治动员》,指出中共的乡村政治动员在革命的不同阶段存在一脉相承与一以贯之的地方,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动员目标都是为了赢得民众参与性、认同性与物质上的支持,二是动员的技术手段不外利益导向的动员和进行身份的塑造、情感导向的动员。

北京大学李秉奎的《抗战时期“群众运动”与“民众生活”的研究视野》,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

来有关中国群众运动或民众运动的研究还是较为罕见;“群众运动”所指的并不限于中共根据地的群众运动,在沦陷区、国统区以及游离于这些地区之外的(如战时日本的华人社会)群众运动和民众生活也应当加以关注和互相参照;此外,战前与战时民间冲突对战争的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课题。

河北大学郑立柱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有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指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史料的整理出版推动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走向繁荣,研究的内容也拓展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进入21世纪,社会史层面的研究异军突起,亦有学者开始利用新革命史等新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根据地的乡村文艺运动是未来研究值得深入的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在《从平原游击战决策的相关研究谈起》的报告中,指出1938年5月中共做出向华北平原挺进的决策,是影响整个战后局面的一个关键点;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与其做出向华北平原挺进的决策有高度联系性,《论持久战》为其向华北平原挺进的决策提供了理论解释与指导。透过对这一案例的研究历程,他进一步谈到,历史学家的关怀与趣向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其研究的结果。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章百家的《抗战时期的中共对外关系——如何再利用外国观察者关于中共抗战的记录》,指出外国观察者在政治倾向上多趋于中立,他们的记录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和作战情况;中国的抗战研究与国际二战史研究的节奏有所脱节,中国对于战争创伤、战争暴行的研究滞后于国外;中日两国之间对于战争的和解,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中日间的战争创伤需要弥合;中国放弃战争赔偿对日本人的影响以及对后来日本援华的影响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南开大学李明楠的《理解“革命”:中共对日认知及政策的思想考察(1921—1955)》,指出战后中共对日认知与政策的基本观念很大程度上形成于其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其中,革命的理念、经验、斗争策略以及统战等对外思维,是分析中共对日政策不可忽视的因素。缺乏对“革命”语境的把握,似难以深入理解战后中共对日政策的意图与行动。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鹿锡俊的《日本学界对战时中共历史的研究——兼谈“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兴起与影响》,将日本学界对战时中共历史的研究划分为两个时段,其一是1945—1979年受“革命中心史观”主导时期,研究视角和观点基本上是站在中共的立场;其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相对化”时代,即摒除“善恶两元论”,既不拘泥于“革命中心史观”,又不拘泥于反“革命中心史观”,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内的中国现代史的一切,都克服先入之见,而基于客观事实,进行相对化的评价,战时中共历史的研究也因此增强了它的多元性和专门性、实证性、创新性。

三、日本侵华专题

日本长崎县立大学祁建民的《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到总力战体制论——战后日本农村战争动员研究范式的变迁》,重点关注了战后日本关于战争动员性质认识上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研究范式转变,指出战后日本关于农村战争动员的研究从“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论”出发,重视法西斯主义与传统村落社会秩序的内在关系,不但从农村运动和村落传统的角度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而且也从村落共同体及其机能组织方面揭示农村战争动员的广度和深度。但在经历了战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对战争批判的减少和战争责任意识的淡化,加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出现了肯定战时动员政策的“总力战体制论”。“总力战体制论”在方法论上将“战前”

特别是“战时”与“战后”联系起来考虑,重视战时政策和社会变动与战后发展的关联,给其后的农村战争动员研究带来广泛影响。

南开大学刘岳兵在《近代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报告中,以时间和逻辑的顺序,以国体论和日本精神论为主线对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思想发展的过程做了详细描述,主要关注到以下三点:其一,日本近现代思想文化中的中国因素或者说中国因素在日本近代的知识构建中的意义;其二,日本近代主要思想家所探讨的国体论与日本精神论的关系;其三,日本近现代思想中与对外思想逻辑相关的问题,比如性别重建和国家意识、对华认识和侵略扩张等。

北京大学唐利国的《日本侵华思想战的思想》报告,指出日本侵华战争也是一场“思想战”,此“思想战”存在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指宣传战,一是在日本军方高层当中凡是与思想有关系的都可称为“思想战”。其研究宗旨为,从日本角度,探讨军方高层如何理解侵华战争,日本知识分子如何论证侵华战争,日本群众如何接受侵华战争,以及日本是如何试图征服中国人的。

南开大学王美平的《战后日本学界的鸦片侵略政策研究述论》,以1985年、2000年为界,把战后日本学界的鸦片侵略政策研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多为概述性研究,第二个时期开始原始资料的整理与出版,第三个时期增强了国际视野。在研究焦点上还讨论了日本在其殖民统治范围内的鸦片战略及其连续性与断裂性问题,日本鸦片政策的性质、效用与主导权问题。

河北大学肖红松的《烟毒与抗日战争研究》,指出中国学界有关抗战时期烟毒问题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著作11部,在资料整理方面也取得长足的进步。相关研究的取向主要集中在日本烟毒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就研究瓶颈而言,外文资料尤其是日伪政权内部原始资料的匮乏是制约研究深化的重要因素。

中山大学(珠海)吉辰《〈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编纂问题再考——兼论日本官修战史的编纂》,详细考察了《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编纂的机构、人员、经费与运作、编纂方针的变化,以及从草案到刊本其间发生的变化。该文指出自1903年起,该战史编纂方针发生了很大改变,主要包括美化日方的开战、避免针对日军行动的军事学术评判以及削减篇幅;该战史对以后日本官修战史的编纂影响深远,乃至在战后编纂的《战史丛书》中亦可看出这样的传承。

南开大学郭循春的《近代日本兵制研究综述》,梳理了国内与日本学界对近代日本兵制的研究成果,指出日本学者研究更为丰富,研究视角不只局限在军事上层建筑,而是扩展到了军队本身、军队周边的地域、士兵个体、征兵制所影响的国民乃至对社会关系的塑造等方面。

南开大学宋志勇的《战后日本侵华战犯审判研究史》,将日本学界对于东京审判的研究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东京审判前后,此间日本学界就已开始研究东京审判;二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处于日本对战争反省的时代,对东京审判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总体而言还是相对客观;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东京审判研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报告认为中国的东京审判研究通过对文献的整理与数据库的建设,会有质的发展。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殷燕军的《战争偶然性问题》,主要介绍了日本学者在七七事变是否存在计划性问题上的研究,及其与中国学者的分歧,并以新近发现的日本野炮联队史记录进一步探讨了事变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围绕此议题,与会学者展开了进一步讨论,基本认为:七七事变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的偶然性并不能否认日本侵华的必然性。

四、其他专题

代表性学者的研究贡献。北京师范大学朱汉国的《王桧林与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详细论述

了王桧林先生与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关系与贡献,指出抗日战争史研究是王桧林先生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其主编的抗日战争丛书推动了抗日战争史的发展,王桧林先生对“中国抗战是一个战场还是两个战场”“中国抗日战争究竟是八年抗战还是十四年抗战”以及“抗战时期的蒋介石集团不属于人民的范畴”等重大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对当今的抗日战争研究仍有启发。南开大学江沛的《魏宏运与中国抗战史研究》介绍了魏宏运先生的抗日战争研究历程,指出魏宏运先生的研究在二三十年中发生过很大的变化,表现在:研究内容的变化,从研究人物转向研究局部战役,再转向财政、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研究;研究范式的变化,逐渐注重把社会史的研究融入到抗日战争研究;研究视野的转变,由单一的对历史的研究特别是从中共党史内部的认识,逐渐向区域史扩展,之后又提倡国际视野,重视外国史料的运用。魏宏运先生的研究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抗战研究历程的一个缩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赵庆云的《井上清与中日史学交流》一文,梳理了日本左派史家井上清与中国史学界的交流,尤其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间的渊源,由此个案可以窥探日本马克思主义学派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军事史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苏圣雄的《从军方到学界:抗战军事史研究在台湾》,指出中国台湾地区的抗战军事史前40年由军方展开编纂、研究,后30年由学界接续展开,学界的研究经历了由传统军事史向新军事史即更加注重战争与社会的关系的转变。抗战军事史研究至今仍然不算学界的主流,未来可在吸收新军事史研究方法之余,不偏废传统军事史研究如作战过程的探讨,或可取得更丰富的成果。中共中央党校齐小林的《由物及人——抗日战争时期战争史研究的某些思考》,认为对战争史的研究可以由物及人或者由边缘到局部来开展,比如可以从战时的粮食供给和分配问题、弹药的供给、士兵的医药卫生、通讯问题等史实性研究着手,并强调研究要具备国际视野,关注物的因素的传入与传播。南京大学郭洋的《七十年来的战时国民党军队政工史研究》,指出既有研究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国民党军政工制度的沿革、政工的表现与评价、以“武主文从”为主的解释体系,未来除可以继续挖掘新史料外,也应着眼于新的视角,如党军关系视角、战时政工与战后政工的贯通等。

区域抗战史与地方抗战史研究。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李斌的《浅谈湖南抗战研究》,指出湖南抗战研究在1949年前主要集中在湖南抗战文化动员、抗战地位与意义、抗战精神等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共党组织在抗战中的作用、薛岳研究、现代化与工业化进程等方面有所拓展。重庆工商大学曾崇碧的《抗战时期地方财政研究综述》一文,指出相关研究在改订财政收支系统、战费筹措等问题上较为深入,在县级财政独立地位及其全面实践、县级自治财政的定位、抗战大后方县级自治财政整理及其效果、县级财政制度背后的利益博弈及社会反响等问题上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旧题新解。南开大学贺江枫的《〈何梅协定〉存在吗?——基于学术史与史实重建的再考察》,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问题研究在史料发掘上有很大突破,史实讨论也逐渐清楚。但当前研究对旧史料应用不够充分,新旧史料的对照也较为缺乏,如此也就形不成总体性的讨论。

在最后综合讨论环节,章百家、黄道炫、苏圣雄、鹿锡俊、高士华就研究选题、研究立场、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国际视野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高士华总结说:抗战史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应有自我总结和自我反省的能力,研究要时怀危机感;年轻一代应熟练掌握最少一门外语,加强对日本等国研究信息的掌握和对日本资料的利用。

[作者张岩,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闫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晓娟)

The CPC's Responses to the Betrayal of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adres in North China Resistance Base Area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Yang Dong, Li Gelin (51)

The cruelt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is well known, so it is inevitable for any Party to have a minority of defectors and traitors. However, the betrayal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ersonnel in the North China Base Areas of the CPC showed different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regions and groups. The defections of a small number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ersonnel to the enemy were, of course, incompatible with the disciplinary requirements of the Communists and even contrary to the objectives of the Communists. Therefore, the CPC paid great attentions to the methods of dealing with the defectors. In the contradiction and entanglement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defecting to enemy" was almost the expression of mutual recriminations of both sides. The Kuomintang accused the CPC from the angle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s rule, while the CPC refuted i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national war of resistance. Because the CPC timely made correct contingency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deal with problems, the defection of a few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ersonnel in the North China Base Areas did not affec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PC's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On the contrary, the CPC was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werful under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spirit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Kuomintang's Works of Arming Civilians in Guangdong under "Military-Civilian Cooper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Guangdong People's Anti-Japan and Self-defense Corps Li Hao (68)

"Showa Trading Company"—A Company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Japanese Army during the War Guo Xunchun (80)

"War! There is War Everywhere!"—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in Goebbels Diary Peter Harmsen (93)

The complete diary of Joseph Goebbels, the Nazi German Propaganda Minister, was only used by historians in recent years. Previous important articles and books on German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have failed to use this historical material.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following problem: to what extent the publication of new materials in Goebbels diary will correct the past views about the extent of Germany's involvement in the Far East crisis. The article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Hitler's role in decision-making in 1937, and gives concrete evidence that the German dictator turned to pro-Japanese position, which was actually earlier than previous speculation. In addition, Goebbels diary shows that the influence of Hitler's view of East Asia by Nazi ideology was perhaps far more beyond previous estimates.

Paper and War: Paper Shortage and the Social Responses in Sichuan during the Tota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Lu Xuming (103)

The Studies on Opium Invasion Policies in the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s after the War Wang Meiping (120)

Commentary on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by Arthur N. Young Wu Jingping (132)

A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War Mobilization and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en Yan (138)

A Summary of the Sino-Japanes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artime Mobilization in East Asian—Impact and Heritage" Gao Shihua (142)

A Summary of "The Fourth High-level Forum on the Study of the Great Rear Area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Gao Xiaobo (147)

A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he Studi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for Seventy Years" Zhang Yan, Yan Yong (152)

General Table of Contents, *The Journal of Studies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2019* (157)